



## 我所认识的“怪教授”陶愚川先生

编辑絮语  
给所有人  
特立独行的  
空间

◎王慧

读罢曲阜师大曹务堂教授《我所认识的“怪教授”陶愚川先生》一文,感慨良多。一是为陶愚川先生崇高的独立人格、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所钦服;二是为当今高校还有没有这样的“怪教授”而思疑。

其实“怪教授”也怪不到哪里去,只是我们判断人的行为标准太过单一,才觉得稍有些出格的人就显怪。其实从其身上,完全可以看到对文化传统和道德的坚守和发扬。

比如我们认为用公家的稿纸,给公家干活找公家报销这么理所当然的事情,陶愚川教授却从来不做,似乎不知道有“报销”一说。“他是全校工资最高的教师,但他每月除留下几十元生活费以外,其余全部上缴给校党委。书出版后的四五千块钱稿费,他也交给了校党委。”这在当代可视作公而忘私的模范行为,陶愚川先生却觉得稀松平常。

他几十年不添一件新衣服,冬天一床破棉被,夏天一件白布褂;东洋西洋均留过学却从不见穿皮鞋。对于物质享受,陶教授可以说从来不挂心上,这种修养的确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。

他因哥哥陶百川是抗战时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,去世前一直在台湾挂名“总统府国策顾问”而被选为省政协委员,但他只去开了一次政协会就提前返校了。作者分析盖因先生长期孤身生活,无法适应那“八人一桌吃饭,两人同室睡觉”的“会议生活”,但我想更重要的是因为陶教授视名利地位如无物的淡泊无欲。

曹务堂教授此文起于2010年7月《中国青年报》上刘健的一篇文章《现在高校还能容下“怪教授”吗?》,其实高校之大,庙堂之高,像陶愚川先生这样的“怪教授”本应多多益善,但是我们现在还容不容得下这样的“怪教授”还真要打几个问号。估计光职称评定这样的事,就能把一批怪教授给磨得没了性子。如果连高校这样号称文化殿堂的地方都不能有几个特立独行的人,那就可以想见,我们的社会价值单一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!

世人多为名利奔忙,而当一个人真的视名利为粪土的时候才会发觉到做人的真性情,才会有多种多样的价值选择,才会有各自不同的行事方式。希望我们的社会给所有人特立独行的空间,给每个人创造不同价值的空间。唯有此,这个社会才丰富多彩并富有生机。

2010年7月9日《中国青年报》发表了刘健的文章——《现在高校还能容下“怪教授”吗?》(下称“刘文”)。文章发表后,立刻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文章以新颖的视角向读者诠释了曲阜师范大学陶愚川、庄上峰、包备五和李毅夫四位教授的另类人生,让人读来耳目一新,感慨良多。我与这四位先生均有接触,也曾经走近过他们的生活。在此,我愿意以拙笔介绍一下我所认识的陶愚川先生。

□曹务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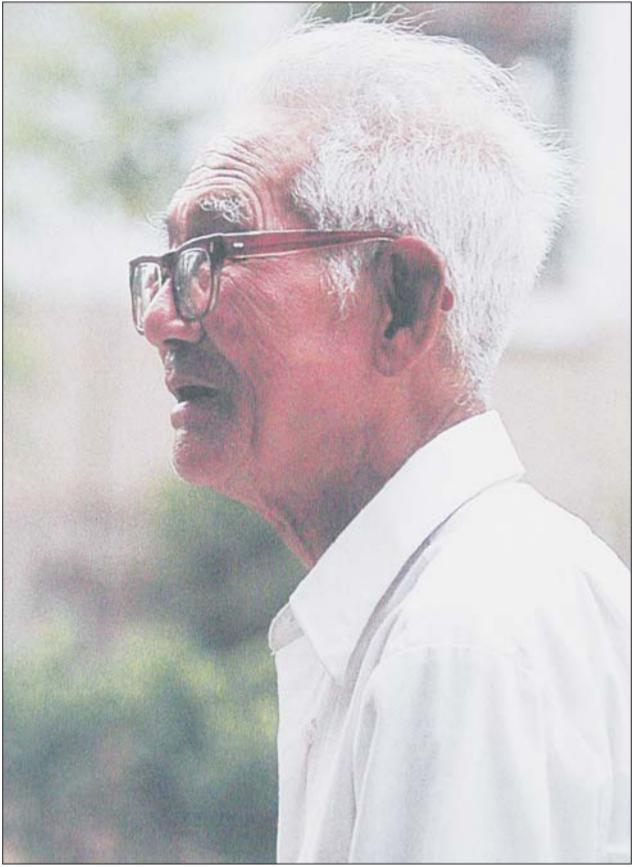
1963年7月我从山东师范学院(山东师范大学前身)外文系毕业,被分配到曲阜师范学院(曲阜师范大学前身)教书。当时陶先生也在外文系任教。先生当年50多岁,中等身材,戴一副近视眼镜,头发有点灰白,说话带着浓重的绍兴口音,但他看起来身板硬朗,精神矍铄。我注意到陶先生走路时总是目不斜视,而且是靠路边走,而那时路上罕见行人,更没有车辆。另外,即使是下课或教研室开完讨论会后,先生也总是溜着墙根匆匆离去。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态令先生有如此的举动,我至今都答案难寻。

正如“刘文”所说“陶愚川……大概三天不说一句话……路遇的师生都恭而敬之地看着他,也没人敢冒昧地上前搭话。”笔者也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情况下第一次与陶先生打招呼的,只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跟他打招呼时,先生一脸的惊恐,好像被什么刺了一下似的。可能是因为从来没人跟他打过招呼,而他也没有想到我会跟他打招呼。后来渐渐地熟悉了,我们见面时也总是聊上几句。而每次见面,先生都彬彬有礼,笑容满面。记得有一次我用英语问他:“Do you walk every day?”(你每天都散步吗?)他笑着用英语回答:“Sure!”(当然喽!)我当时感到先生的用词十分新颖,不愧是留美学者。因为当时我只知道“sure”可以用作形容词,而不知道它还能用作副词。

通过30多年的接触和观察,我认为先生在人格修养方面已达到了很少人能够企及的高度。

“他是全校工资最高的教师,但他每月除留下几十元生活费以外,其余全部上缴给校党委。书出版后的四五千块钱稿费,他也交给了校党委。”(引自“刘文”)然而他自己却过着极其清贫甚至寒酸的生活。几十年中,我几乎没有见先生穿过一件新衣服。他夏天穿一件几乎变灰了的白布褂子,脚穿一双有时露出脚趾的普通布鞋。先生虽然留学过美国和日本,供职过国民党教育部,也任职过大夏大学(华东师范大学前身)教育系主任和中山大学教授,但我从来没见过他穿过皮鞋。春秋秋天始终穿他那件灰不溜秋的干部服,冬天则是一件十分单薄的破棉袄,一双破棉鞋,且不穿袜子。

先生宿舍(注:原附中礼堂东侧排房一个单身教工住的小房间)的简陋条件更是令人难以想象。不知为什么,据说他从不让人进入他的宿舍。如果有人找他,他只把门开一条小缝,说完话立刻把门关上。记得1973年深秋的一个上午我去他宿舍请教问题,听到敲门声,他还是照例问了一句“哪一位?”我自报家门后,他把门打开,破天荒地让我进去了。进屋后,我仿佛走进了一个神秘而可怕的荒凉世界。因为他从不开门窗,刺鼻的发霉味几乎令人窒息。房间内吊着一个小灯泡,光线十分昏暗。我对他说:“陶老师,你视力不好,为什么不换一个度数大一点的灯泡呢?”他笑了笑说:“为国家节约。”(要知道当时根本就



陶先生从不现身于张扬的公共场合,所以,曲阜师大没有一张他出席任何会议的照片。据说,该校现存的他这张侧面单身头像还是摄影师远距离“偷”拍的。

不收电费)

我环视一下房间,只见靠西墙有一张床,上面挂着一顶几乎变成灰色的蚊帐,床下堆着破烂不堪的被褥和衣物,西南墙脚歪七扭八地堆着一摞书,窗户紧紧地关着,上面布满了蜘蛛网,窗户下面是一张小条桌,上面摆放着他唯一的餐具(一个多处掉了瓷的大茶缸)和他乱七八糟的东西,桌子西端有一小块地方尚还干净,看来是他吃饭的地方,其他桌面皆被尘土覆盖,桌前放着一个方凳。进门后,先生很客气地示意我坐下。我看了看,实在是无地可坐(因为我不敢坐那个凳子,而让先生站着),于是,问完问题后,我便匆匆与先生告别。我真不知道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先生是如何生活的。然而,令人惊喜跟称奇的是,我从来没有见他生过病。

不论是备课还是写他那9卷300万字的《中国教育思想史》,陶先生从来都没有用过一张公家的稿纸(尽管当时学校是给教师发备课纸的);不论是回故乡绍兴写书,还是到上海图书馆查找资料,先生从来都是自费。(我敢肯定地)说,在先生的心中根本就没有“报销”这一概念)。

为了收集写教育史的材料,先生每天都在上衣口袋里装着一个小学生算术演草本和一个铅笔头,以便读报时随时记下材料。有一天我路遇先生从离学校两公里的汽车站回来。我问他:“陶老师,您到汽车站干吗?”他告诉我是到汽车站的报栏看报纸。我甚为不解,便问他:“学校不是有阅报室吗?”他回答说:“那里安静。”我听了一愣,而且至今也不明白当时先生说的“安静”是什么意思。

陶先生一向谦虚为人,低调处世。他从不现身于张扬的公共场合,所以,我校没有一张他出席

任何会议的照片。据说,我校现存的他那张侧面单身头像还是摄影师远距离“偷”拍的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可能是为了落实统战政策【因为“他的大哥陶百川,是抗战时期的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,去世前一直在台湾挂名‘总统府国策顾问’”(引自“刘文”)】。陶先生被选为山东省第六届政协委员。据说他只去开过一次会,而且在会议中途就提前返回学校了。我没有问过先生为何提前返校,但我认为,其原因是:由于先生长期孤身生活,他无法适应那“八人一桌吃饭,两人同室睡觉”的“会议生活”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每个星期三下午是教职工政治学习的时间。学习时,大家都围坐在一张大阅览桌周围,可陶先生从来都不坐在阅览桌旁。他总是早早地到阅览室,然后搬一把椅子坐在门后面的角落里。有时领导也让他往前坐,但他从不为所动,后来领导也只好听之任之了。学习讨论时,大家都热烈发言,但陶先生却从来一言不发。我记得他唯一的一次发言是在“文革”后期的一次讨论会上。他口若悬河,旁征博引,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。至于他当时说了些什么,因年代久远,我已经记不清了。但他的发言给我留下的印象却至今依然历历在目:思路清晰、谈吐条理、学识渊博、记忆力惊人。

先生终身未娶,吃饭全靠食堂,连鸡蛋也不会煮,却拒绝领导给他请保姆。

陶先生终身未娶,又不会做饭,吃饭全靠食堂。即使在回绍兴老家写教育史时,行前他也向领导询问家乡的公社是否有食堂,

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,他才启程。

到了晚年,我看先生体质日渐衰退,牙齿脱落,走路也有点摇晃,有一次打饭时还摔了一跤。对一位老人来说,食堂的饭菜毕竟不太合口味。有一次我在校门口的集市上遇见他,对他说:“陶老师,您怎么不买点鸡蛋煮煮吃?”他惊奇地看了我一眼,继而露出一丝无奈的微笑,不解地问道:“鸡蛋怎么煮?”是啊,对他来说,“煮鸡蛋”可能比上天还难。于是我马上意识到自己问了他一个十分愚蠢的问题。为了照顾他,后来领导也曾试图给他请个保姆,却被他断然拒绝,理由是他从不愿麻烦别人。

“文革”一开始,陶先生就被打成了“牛鬼蛇神”,像他这样的家庭背景和身份(有海外关系,本人又是“反动学术权威”),当时的外文系打一个“牛鬼蛇神”也是他,故当时在外文系盛行“陶(愚川)、李(毅夫)、星(兆钧)、庄(上峰)四大‘牛鬼蛇神’”之说。那年月,在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的号召下,运动来势凶猛,大字报铺天盖地,游街批斗日夜进行。搞了一段时间的揭发批斗之后,“红卫兵”看到在他们身上实在挖不出什么“反党”言论,于是就把他们视为“死老虎”关进“牛棚”劳动改造。

不知当时的“领导”是出于怎样的考虑,把最脏的活(管理大粪)派给了陶先生一个人。只见他每天肩扛铁锹,手拿三齿钩,准时到大粪场“上下班”。他的任务就是把大粪摊开晒干,然后砸碎堆起来,以备学校种菜使用。我看他十分“忠于职守”,有人没人一个样。即使夏天烈日高照,他也不戴草帽,不喝水(他根本就没有暖水瓶),累了就坐在大粪旁边休息,可能他认为那就是他的岗位,他必须坚守。实际上,对陶先生的迫害在

1964年的“四清”运动中就已经开始了。当时陶老师在教语法(Grammar)(注:“文革”中陶先生曾编过一本语法讲义交给了当时的系领导,却被当做废纸扔在一边,后来也下落不明)。先生的渊博知识和流利纯正的英语令学生十分崇拜,甚至有的学生还模仿先生的走路风度。就因此,在外文系莫名其妙地搞出了一个什么“Grammar委员会”反革命小集团,硬说陶先生是后台,对他和几个学生进行无休止地批斗。陶先生从不跟外界接触,何来“后台”之罪?然而,在那个“阶级斗争天天讲”的时代,在某些人的眼里,阶级斗争时时有,阶级敌人处处在。真是“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”啊!

正如“刘文”所说:“这些‘怪教授’们,如果不是在大学校园,社会上还有哪儿能够让他们容身?而如果一所大学连一个‘怪教授’都留不住,容不下,全是一些‘正常人’,又将是多么寂寞,多么俗不可耐!”因此,刘健先生向世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:“现在高校还能容下‘怪教授’吗?”这是一个多么发人深思而又耐人寻味的问题!

虽然陶先生已作古多年,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,他那高尚的人格使我受益终生。

(作者系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)